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二十一辑·

主 编 徐 中 玉 郭 豫 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一辑/徐中玉,郭豫适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ISBN 7-5617-3485-9

I. 古... II. ①徐...②郭... III. 文学理论—中国—古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403 号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一辑)

主 编 徐中玉 郭豫适
责任编辑 钟明奇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宜兴市德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45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2500
书 号 ISBN 7-5617-3485-9/I·283
定 价 24.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徐中玉 郭豫适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齐森华 朱良志 张少康

张伯伟 胡晓明(执行编委)

黄霖 曹旭 蒋凡

蒋寅

目 录

◆先秦两汉文论◆

- 从郭店楚简与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看扬、班关于屈原的评价
..... 汪春泓 (1)
- “绘事后素”意义指向及其在文论中的表现 雷恩海 (10)
- 汉代谶纬学知识谱系中的儒家文论 程 勇 (23)

◆六 朝 文 论◆

- 《典论·论文》“齐气”研究略评 项念东 (45)
- 陆云“雅好清省”的文学审美观 龚 斌 (57)
- 两晋赋序与文学批评 赵厚钧 (64)
- 《文心雕龙·论说》篇探蕴 陈复兴 (80)
- “宗经”还是“重文”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辨析 孙蓉蓉 (97)
- 读《文选·序》 朱晓海 (110)
- 六朝文体意识探微 贾奋然 (123)
- 陶渊明之被误读及其原因 曾业桃 (148)
- 刘勰与萧统的分野 刘 畅 (160)

◆宋代文论◆

- 试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的文学批评价值 彭国忠 (179)
- 《六一诗话》的历史困惑 李俊标 方 艳 (193)
- 《沧浪诗话》的“兴趣”与唐宋诗学的流变 黄宝华 (205)
- 从“《诗》、《礼》相解”论王安石的《诗经》学 方笑一 (223)
- 论姜夔《大乐议》的音乐思想 赵晓岚 (239)
- 《诗品》的流传与诗话的创体及演进 蔡静平 (254)

◆明清及近代文论◆

- 论清代科制有律赋批评 许 结 (265)
- 张问陶诗学思想研究 刘运好 (282)
- 元代戏曲理论中的“娱乐”说 王忠阁 (296)
- 论李渔剧学声律论的特征 吴瑞霞 (305)
- 论“常州学派”与“常州词派”之关系 朱惠国 (314)
- 论中国古典史剧理论的批评范式:代置式 孙书磊 (332)
- 从《石洲诗话》到《石遗室诗话》
- 清代宋诗派观念的衍变 严 明 (347)
- 论陈衍诗论中的“困寂说” 程亚林 (362)
- 《石遗室诗话》与晚清民初士人诗歌生活 胡晓明 (371)
- 字重光坚:沈曾植的“以经发诗”观念 李瑞明 (393)
- 从“追体验”到客观化
- 徐复观文学研究方法论及其成就 王守雪 (414)

◆诗学短简◆

- 说“穷苦之言易好” 徐子方 (438)
- 说“飘逸” 林继中 (444)
- 说“偶然” 张 晶 (452)
- 禅思与诗思之别 周全田 (467)

◆域 外 诗 学◆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多瑞·莱维著 陈引驰译 (478)

韩国诗话论楚辞述评 詹杭伦 (504)

从郭店楚简与马王堆帛书

等出土文献看扬、班

关于屈原的评价

汪春泓

屈原的身世文章,历来令人心生疑窦,然而荆门郭店楚简与此前马王堆帛书的出土^①,对于研究屈原具有拨云见日的意义,许多疑惑可以因此而得到解释。屈原在政治上属于理想主义者,而汉代士人比较现实地体会到政治思想与实际之间的鸿沟,因此士人们结合自己的遭际,关于屈原行为的得失,就生发出不少议论,其中以东汉班固《离骚序》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影响较大。

考索班固的论点,几乎全出于扬雄。《汉书·叙传》称扬雄为“父党”,扬雄与班固父亲班彪以及从父班嗣过从甚密,班固称颂扬雄“潜于篇籍,以章厥身”。班固《答宾戏》说“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昔君之门闾,究先圣之壶奥”。班固为扬雄在《汉书》中作传,可见他非但熟悉扬雄的学术和性情特点,而且还十分崇敬扬雄的道德文章。扬雄是开东汉风气的人物,对于东汉士人的学风和人生观影响极其深远;作为扬雄的后学,在《汉书》等著述中,班固受到扬雄的影响均可考见。按班固《离骚序》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

①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易传·文言·乾》说:“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可见他侧重从《易》学观方面来表达对屈原的微词,而关于屈原这样的评价则基本上渊源于扬雄。

扬雄学问渊博,在西汉学者中,除了崇尚孔儒正道之外,其学风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易》、《老》融合。关于《太玄》写作之缘起,《汉书》本传曰“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可见扬雄对于《易》尤其重视;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扬雄对于《离骚》报以高度的赞赏。《反离骚》说“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歎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濊!溷渔父之铺歎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蹢彭咸之所遗”,从《老》学角度出发,自然不认可屈原的自沉,这是他少时深受蜀人严遵(字君平)影响使然;严遵著《道德经指归》等。在《法言·问明》中,扬雄表达对于严遵“久幽而不改其操”的仰慕,他特别醉心于“幽”的境界。其《太玄赋》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均《老》、《易》结合,虽然以正儒为标榜,但是他对《老子》和《庄子》的倾心还是不能掩饰的。班固《幽通赋》也说:“周、贾荡而贡愤兮,齐死生与祸福。”即使上述《离骚序》的立论俨然出自儒者的说言,然而他也与扬雄一样,借助《老》学来阐述人生应全命避害的观点,此使扬、班学术和人生观蒙上一层老庄或庄老的色彩。《汉书·扬雄传》记述扬雄读《离骚》,“悲其文……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璿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骚》。《畔牢骚》、《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其辞曰……”据此可见班固《离骚序》的观点出自扬雄,扬雄《反离骚》说:“衿

芰茄之绿叶兮，被夫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闻兮，不知嬖而幽之离房。闺中容竞渌约兮，相态以丽佳，知众嫫嫉妒兮，何必颺累之蛾眉？懿神龙之渊潜，俟庆云而将举，亡春风之被离兮，孰焉知龙之处？愍吾累之众芳兮，颺烨烨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庆夭頼而丧荣。”对照上述班固“且君子道穷，命矣”云云，可证班固之屈原论的确接受了扬雄的见解，也从“潜龙勿用”和“明哲保身”的处世准则来评判屈原的行为，扬雄《反离骚》说：“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乎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扬、班等均认为个体生命的价值远在短暂政治生命之上。

《离骚》之作，是在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 313 年）屈原遭谗被疏之后^①，而屈原思想形成于此之前。因郭店楚墓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郭店楚简抄写完毕的年代自然应早于墓葬年代，因此与屈原活动的时代相去不会太远，而略早于屈原写作《离骚》时间的可能性极大。庞朴先生《“太一生水”说》指出屈原《九歌》多祀第一尊神，便是东皇太一^②。可见“太一”在郭店楚简编辑者与屈原心目中均居于最崇高的位置。饶宗颐先生《帛书〈系辞传〉“大恒”说》研究了西汉马王堆本《系辞传》，指出“《楚辞·天问》：‘恒稟季德。’恒是殷先公的王恒，见于卜辞，屈子在文章中加以质疑，足见殷代史事在楚地流行久远”^③。《离骚》中屈原问惑于巫咸，巫咸告之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修好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鸱鸢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楚辞·九章》之《惜往日》也有与此比较接近的片段文字。）对照郭店楚简之《穷达以时》篇

① 参见汤炳正等著《楚辞今注》，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② 此文刊于《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 21 辑），189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③ 刊于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 3 辑《马王堆帛书专号》，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说：“有天人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舜耕于历山，陶埴于河浒，立而为天子，遇尧也。邵繇臬盖，冒经蒙巾，释板筑而佐天子，遇武丁也。吕望为臧棘津，战监门来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举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管夷吾拘繇束缚，释械桎而为诸侯相，遇齐桓也……”再参看《孟子·告子下》等也有类似的文字。楚简整理者认为“邵繇”之名不见于各书，然所记为“传说”之事，此大致上与《离骚》是相对应的，说明北方主流文化中的圣贤明君谱系在楚国也深入人心。比较《离骚》和楚简两处文字，说明遇与不遇，其中有“天”的因素，当时士大夫颇能产生共鸣，无疑《离骚》的写作受到了当时这种普遍感喟的影响。但是，屈原借助巫咸之口，表达了更重视自身修炼的思想，相对于楚简，屈原对于明君贤人的风云际会并不抱听天由命的态度；在天人之际，屈原突出了人主体一边的进取精神，他要与命运抗争。而扬雄则不然，其《解嘲》说：“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帚彗而先驱。”然而对于自己的命运，他还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甘于清静以自守，重在全身以避害，故《太玄·达》说：“上九：达于咎，贞终誉。测曰：达咎终誉，善于道退也。”《太玄·奕》说：“阳气能刚能柔，能作能休，见难而缩。”这说明他也并非主张无所作为，然而当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则绝不提倡义无反顾地前进。

以《老子》解《易》，再来评价屈原的人生选择，自然会对屈原的执著发表不赞同的意见。扬雄《解嘲》说：“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法言·问明》说：“或问‘君子’。‘在治曰若风，在乱曰若凤’。或人不谕。曰：‘未之思矣。’曰：‘治则见，乱则隐……’”以此为人生出处行藏的准则来评价屈子的宁折不弯，扬雄《法言·吾子》说：“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显然不认为屈子是明智的人物。

为何西汉时期士人推崇《老子》，而落实到政治和人生，其见解又

颇存歧异？譬如扬雄《法言·寡见》说“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汉书·扬雄传》载桓谭说：“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足证司马迁确实赞扬过《老子》的精妙。而扬雄与司马迁一样，《老》、《易》兼治，然而在立身处世等大节上，却看法迥异，由此可以想见其《易》学之不同。

王葆玟先生《南北道家贵阴贵阳说之歧异》一文指出，在战国时期，道家分别以齐楚为中心，形成了北方道家尊崇“黄老易”的系统，以及南方道家尊崇“庄老易”的系统^①。王先生的创见很有启发意义，确实《易》学本身就潜含着向着“黄老”或“庄老”转移的可能性，而解《易》者或尚阳刚或尚阴柔或主张刚柔并济，都会使《易》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个性面貌，而这区别的本质在于以《老》为中轴，它可以转向“黄老”，亦可以转向“庄老”，而“黄”与“庄”则正体现出入世与出世的差异。早在屈原在世之时，按《楚辞·渔父》即可看到“黄老易”与“庄老易”的直接交锋，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表示其随顺时势的人生观，暗讽屈原之不能与世推移，渔父显然是一隐士，体现出庄老的处世哲学。而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万世师表”，就是因为他事事采取折衷的态度，《论语·述而》说：“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一方面积极进取，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世精神；另一方面，如上述班固《离骚序》中所引用的《论语》典故，则反映出孔子面对乱世时亦具“智”和“隐”的性格，然则“黄老易”或“庄老易”仅各得孔子出处观之一端。司马迁之《易》学，按《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太史公“受《易》于杨、何”，然又“习道论于黄子”，由于其道论即黄老之学，所以其《易》学大致属于“黄老易”，具有积极进取昂扬刚健的特点，则与扬

^① 王葆玟：《南北道家贵阴贵阳说之歧异》，刊于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5辑，5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雄所接受严遵的“庄老易”有很大的区别,譬如近代叶德辉为杨树达著《周易古义》作序说:“王、韩二家《注》,知之而宗尚虚玄,流于老、庄,致可惜也。”^①认为魏晋人注《易》,透露着老庄的意思,其实他们正是庄老易之流裔。《汉书·扬雄传》载《法言》写作之缘起曰“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误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扬雄《法言·问神》说:“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他是将刘安与司马迁置一起来给予评论的,确实看到了两人之间具有相通之处。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则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哲且明,能保其身’,难矣哉!”对照班固与扬雄关于司马迁的评论,他们也深为司马迁不能“既哲且明”而为之惋惜,说明此种惋惜与此辈同情屈原的遭遇,其内心的情感反应比较相近,均是以一种相对内敛退隐的人生观来审视另一种积极奋进的人生追求,他们看到了前人悲惨的境遇,则认为这样的人生是不值得的。此可以证明班固所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云云,仍然基本上是继承了扬雄的“是非颇谬于经”的意见。司马迁的“先”、“进”和“崇”与屈原的“露才扬己”相似,都不甘心随顺,而且正因为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才必然导致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黄老”在其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屈原和淮南王刘安、司马迁一样,假使对他也进行分类的话,其学术偏于“黄老易”一边,按清代精于《易》学的著名诗人钱澄之《庄屈合

^① 杨树达:《周易古义》,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诂自序》说：“岂惟屈子本于《易》？屈子亦《易》也。《易》之时乘六龙，有潜有亢，庄处其潜而屈当其讥，时为之也。吾以屈子续《诗》，庄子亦诗人也。诗可以群，可以怨，屈子其善于怨，庄子其善于群者乎？”（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三，黄山书社，1998）所以扬雄、班固与屈原、淮南王以及司马迁思想上的分歧，其实大致上可归于“庄老易”和“黄老易”的对立。

马王堆帛书关于《易》学的文献正属于“庄老易”的范畴，恰好可以为扬雄、班固的屈原论提供注脚。按陈松长、廖名春整理的马王堆《二三子问》、《易之义》和《要》三篇帛书，他们尽量给出释文，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①。其中《二三子问》解释“言有序”曰：“君子虑之内，发之□□□□□□□□不言害，塞人之恶，阳人之美，可谓‘有序’矣。”《易经》中《艮》卦爻辞《六五》说：“艮其辅，言有序，悔亡。”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言有序，不妄谈也。”^②《易传·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四时合其序”。可见“言有序”并不指人说话的有条有理，而是指人像天地四时之静穆。扬雄《法言·问神》说：“或问‘文’。曰：‘训。’问‘武’。曰：‘克。’未达。曰：‘事得其序之谓训，胜己之私之谓克。’”《太玄·文》说：“初一：袷纁何纁，玉贞。测曰：袷纁何纁，文在内也……次三：大文弥朴，孳似不足。测曰：大文弥朴，质有馀也……次四：斐如郛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测曰：斐郛之否，奚足誉也。”认为外在的文采不足称道。据此，如屈原的直抒胸臆就不能称之为“言有序”。而从“事得其序”和“胜己之私”又引出“文”与“武”的概念，按《易之义》释文曰“……是故良马之类，广前而景后，遂臧，尚受而顺，下安而静，外有美形，则中有□□□□□□□□乎昼以来群，文德也。是故文人之义，不待人以不善，见恶默然弗反，是谓以前戒后，武夫昌虑，文人缘序。易曰‘先迷后得主’，学人谓也，何先主之有？……武夫有拂，文人有辅，拂不挠，辅不绝，何不吉之有？易

① 三篇释文刊载于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马王堆帛书专号）。

②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313页，中华书局，1991。

曰：‘直方大，不习，吉。’子曰：性文武也，虽强学，是弗能及之矣。易曰‘含章可贞，吉’，言美情之谓也。文人动，小事时说，大事顺成，知毋过数而务柔和。易曰‘或从事，无成有终’。子曰：言诗书之谓也。君子苟得其终，可必可尽也。君子言于无罪之外，不言于有罪之内，是谓重福……有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易曰‘括囊，无咎’，子曰：不言之谓也。□□□□何咎之有？默亦无誉，君子美其慎而不自著也。渊深而内其华。《易》曰‘黄裳元吉’，子曰：蔚文而不发之谓也。文人内其光，外其龙，不以其白阳人之黑，故其文滋章。易□□□既没，有爵□□□□□居其德不忘，‘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子曰：圣人信哉！隐文且静，必见之谓也。龙七十变而不能去其文，则文其信于（按此字衍——整理者注）而达神明之德也。”对照《史记·晋世家》说：“（介子）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从其尚柔和隐忍的品格而言，这样的易学思想属于“庄老易”一派，扬雄与之当颇有兴会。而认为文德具有审慎寡言的特性，尤其指出文人之义应“见恶默然弗反”，而且君子“不言于有罪之内”，以此种种美德若反观屈原的言行，必然深感与之凿枘不合，屈原《怀沙》说：“玄文幽处兮，矇谓之章……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他总是要竭力彰现其内外之美，西汉文、景时的庄忌《楚辞·哀时命》说屈原“独便娟而烦毒兮，焉发愤而抒情”。班固和扬雄所谓屈子“露才扬己”与“不智”的判断就缘此产生；刘安《离骚传》说《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絮，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迕而见义远。其志絮，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以此对照《易之义》释文说：“微显赞绝，巽而恒当，当名辨物，正言巽辞而备。本性仁义，所行以仪刚柔之制也。其称名也少，其取类也多，其指简，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隐而单。因济人行，明失得之报。”与之相似，扬雄《法言·问神》说：“……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

幽与明、远与近、大与小以及微与著在扬雄意识中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显然刘安外放，而《易之义》“其辞文”就包含着上述“文德”之义，具有曲和隐的风格，两者人生姿态的取向迥然不同，也正说明“黄老易”和“庄老易”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汉书·司马迁传》载司马迁《报任安书》说自己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然后接着列举古来发愤著书者，其中称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云云，此也是基于“黄老易”的不屈抗争。《汉书·冯奉世传》说：“赞曰：《诗》称‘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齐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经曰：‘心之忧矣，涕既陨之。’冯参姊弟，亦云悲矣！”关于写作《离骚》的缘起，班固亦理解司马迁所谓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创作心理，而在“庄老易”一派眼里看来其实同为“露才扬己”，均属无谓者也，足见班固关于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也是本乎“庄老易”学观所得出的结论，“六经”其实也被“庄老”化了。关于屈原和司马迁的两种批评所依据的学术背景具有内在的联系。而作为“黄老易”系统，譬如解释“括囊，无咎”，《荀子·非相》篇说：“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与上述肯定“君子美其慎而不自著也”恰好相反，从中亦可窥见“黄老易”与“庄老易”之间的分庭抗礼。

由此可知，在刘勰之前，诸如汉代的屈原论大都出自个人学术和境遇角度，有借题发挥的意味，几乎均意不在论文。只有到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等篇问世，才算真正出现了关于屈原的文学评论。

“绘事后素”意义指向 及其在文论中的表现

雷恩海

在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发展史上,许多概念与范畴的提出,往往具有丰富的意蕴,并随着后人的踵事增华,使得这一概念与范畴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彩,且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因此,理解这一概念、范畴的最初意蕴,并进而探讨其踵事增华、与时俱进的内涵,对于研究、理解艺术创作的相关专题,阐释丰富复杂的艺术创作实践颇有裨益。儒学先师孔子所提出的“绘事后素”的论题,具有丰富的意蕴。所惜先贤大都局限于经学的范围而作解释,时人虽有解说,却受视阈之限制,未能作深入的探讨,从而使得这一论题丰富的意蕴未能揭示出来。

绘事后素出自《论语·八佾》篇,曰:“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绘事后素,乃孔子观画之直接感悟,并移之来论诗。皇侃《论语集解》引郑玄注,以为绘画应首先用“众色”敷色绘画,然后再用白色来使之分明,增强画面的色彩对比和层次感,凸现绘画的整体艺术效果。孔颖达《正义》引《周礼·考工记》“画绩之事后素功”作进一步的阐释,强调绘画重在于杂用五色,形成美的图案,而以善于运用白色来协调色彩的分布,加强色彩的对比和画面的层次感,凸现画面的整体艺术效果,达到美的表达。

朱熹的理解则与此不同。《论语集注》曰:“绘事,绘画之事也。